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 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王晓莺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400)

[关键词] 晚清; 岭南; 留学生; 现代化

[摘要] 翻开近代中国留学史,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特别引人注目。首先, 他们是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其次, 他们是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再次, 他们也是肇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启蒙者和先导者, 而且在一定的客观程度上, 积极推进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最后, 他们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 就是起着开风气之先, 最早吸取和引进西方先进文化, 并把它辐射到全国去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 D634.2;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3)04-0054-08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Ling-nan students abroad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WANG Xiao-y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00, China)

Key words: late Qing period; Ling-nan (the south of Five Ridges);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modernization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abroad from Ling-nan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early Sino-West cultural exchange in modern time. As pioneers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going abroad, the students of Ling-nan served as an important bridge to link China and the West. They became the guide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renaissance in China. This group also absorbed and introduced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spread it into other parts of China. In short, the students abroad from Ling-na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一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自1847年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三人赴美留学起, 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止, 在这长达67年的中国近代留学史阶段中,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对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多方面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03-01-28

[作者简介] 王晓莺,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广东史的教学以及主要研究近现代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侧重当代中国留学生的研究。

如所周知，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出国留学生，非晚清时期出国留学的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三名广东香山籍（现广东中山）的青年莫属。当然，如果按出国留学生的种类划分，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三人，应该属于教会留学生，他们是由来华的传教士出于培养信徒的需要，而资助出国留学的。不过，与当年资助容闳、黄胜和黄宽等出国留学的香港教会资助人的意愿相反，容闳等都没有成为传教士。尤其是容闳，没有为获得入美国耶鲁大学深造的贫苦学生奖学金，而具结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的志愿书。

容闳，不仅如其自称的“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即第一位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而且，还是公认的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中国留学生之父”。正是由于留学归国后的容闳百折不挠地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材”^[1]的留学创议，并说服了洋务运动的两位领袖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才有后来晚清政府批准的120名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先例。也正因为如此，后人称：“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2]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之嚆矢始源于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拓荒人和创始者。

如果说，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三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留学生，那么，由容闳创议留学的晚清留美幼童，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公派留学生。而这120名公费留学生中，选派的广东籍出国留学生总数为84人，占留美幼童总人数的70%。第一批出国的30名留美幼童中，有24名是广东人，占总人数的80%；在之后的三批中，广东人也占65%。^[3]所以，无论是教会留学生，还是公派留学生，中国近代最早的出国留学生，多为晚清时期出国的岭南留学生。他们既是近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开创者，又是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不仅如此，与容闳同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之一的黄宽，于1849年从美国转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科学习，他“是中国人首先赴欧、美学习西医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留学史和近代医学史上的先驱者之一”。^[4]此外，广东籍的青年何启和伍廷芳也分别于1872年和1874年，到英国自费留学。这比1875年，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选派魏翰等五人往英国、法国参观学习，以及1876年李鸿章派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的时间都要早。也就是说，就近代中国人留学欧洲而言，晚清时期岭南自费出国留学者们留学欧洲的时间比起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欧学生出国的时间要早得多。

在近代中国留学欧美的运动先声的感召下，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刺激下，清廷终于在1896年派遣唐宝锷等十三名学生赴日本学习，揭开了近代中国政府官派留学日本的序幕。他们当中的广东香山人唐宝锷，1905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5]他是中国近代最早毕业于日本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的两人之一。^[6]此外，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冯自由，则是1895年夏返回到日本自费留学的。所以，同样确定，近代中国人开创留学日本之先河者，仍然是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实乃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们不仅开创近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日本之先河，也成为近代中国学生留学欧洲的前驱先辈，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写下闪光的一页。

二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特别是在科技、医学和文学、艺术及图书交流等方面，他们对“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对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着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在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先进科技方面，120名官费留美幼童是中国近代最早通晓西学的人才。“就在这批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锋队中，出现了第一批中

国工程师、铁路家、电话工程师、矿冶及海军专才”。^[7]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广东人，所以说，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是中国近代早期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的重要桥梁。

在医学方面，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黄宽和何启都是在中国近代为西医在中国传播作出杰出贡献的两位先驱者。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黄宽（1828—1878）于1849年从美国转赴英国学医，185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归国。历任广州惠爱医院医师、香港国家医院院长。精通解剖学的他，^[8]与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友好合作，为中国培养第一批西医医师，推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以至于嘉约翰在评价他这位英年早逝的助手时提到：“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榜样”。^[9]与黄宽不同，广东籍的青年何启是1872年到英国学习的。他在留英期间，先在阿伯丁大学学医，后到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律。不仅取得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还获得了大律师资格，并于1882年回香港做大律师。直到1887年才在香港创办雅丽氏医院，并附设西医书院。这西医书院是香港第一所大学专科学校。^[10]“该校以‘启发中国人之科学研究兴趣及新式医术，促进国民健康’为宗旨，培训出不少华人医生，孙中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11]

打开中国近代中西美术交流史册，一批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的名字便跃然纸上，他们分别是：留学欧美的李铁夫、冯钢百、黄潮宽和李超士……，以及留日的何香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和郑锦……等人。他们皆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美术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主要开拓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到西方学习绘画的先驱。就拿李铁夫来说，他是于1887年进入英属加拿大的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其后又转到美国学习的，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到西方学习绘画的人”，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美术留学生”。他的写实油画在美国获得很高的荣誉。李铁夫的“油画造诣，在中国现代第一辈的油画家之中，几乎没有人可与之比肩”。而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则在近代中国画坛上，创建“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独树一帜的新画派——“岭南画派”，三人被世人誉为“岭南三杰”。

无怪有学者认为：美洲与日本是培育广东近现代“第一批西画家的两个最主要的地区。美、加画坛的现实主义氛围培育了广东早期的写实油画大家，而日本画坛的多彩纷呈则是造就了广东早期的美术活动家和新派画家”。从19世纪末开始的、延续了半世纪的中国留学热潮造就了广东近现代“最早的、最优秀的一批油画家。这一批飘洋过海的岭南学子，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美术的第一步。在欧风美雨的熏陶下，他们都以超越中国传统绘画为价值取向，接受了当时流行欧美各国不同的绘画风格”。“广东的这批学习西方绘画的先驱回国后，在广东掀起了传播西方美术、兴办现代美术教育的巨大浪潮”。“为创建广东现代西画进行了积极的、广泛的探索”，使得“油画等西方绘画样式在广东形成了一个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系统，进入中国人的艺术生活领域”。另外，这批晚清时期岭南出国学习美术的留学生，“都具有着强烈的革命意识，把留学（游学）与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直接联系起来。他们是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唤醒国魂’的强烈使命感驱使他们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政治活动”。李铁夫是这样，何香凝亦是如此。^[12]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杰”当时的国画作品，被誉为“志士之作”的原因，也缘于此。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人在大量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教育书籍的同时，也陆续翻译西方文学，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文学观念、以译介外国文学为专长、为己任的文学翻译家和作家”。广东籍留英学生伍光建便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卓有成就的著名文学翻译家和作家之一，他先后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和莫泊桑、雨果、法郎士及狄更斯、菲尔丁等英法著名作家的多部作品，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13]

至于广东籍留日学生作家苏曼殊，“他博学多才，精通英、日、梵文，能诗文，擅长绘画”，

既是一位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南社的重要诗人，也是一个中国近代文学家和近代文学翻译的大家。“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他，在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方面有很高成就。特别是他的小说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新旧交替、中西杂糅，“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向现代白话小说过渡的桥梁，对促进‘五四’新小说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位中国“近代颇负盛名的翻译家”，^[14]“苏曼殊在梵文的介绍、佛学的阐发、西洋文学的翻译、汉诗英译及英诗汉译的编集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15]他“热心译介西方近代文化”，尤其是译介“歌德、拜伦、雪莱、威廉·豪易特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16]

其实，在中国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从事中外文学作品译介工作的，不仅有学习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少数学习自然科学、但国学功底良好的中国留学生也参与其中。岭南留美幼童蔡廷幹在晚年曾经用英文著有“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一书，即《唐诗英韵》（该书后于193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17]该书所译的一百二十首唐诗，^[18]“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它“对美国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起了巨大作用”。蔡廷幹“晚年还写了研究老子的著作《老解老》一书，在美国也有较大的影响”。^[19]

就文学领域而言，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交汇中，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正是通过译介方式，通过自己的翻译和创作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外国优秀文化的精髓，既为“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起着架桥铺路的作用，又为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实，在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既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富有才气的革命诗人，“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他们的革命诗文，传播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念，对正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们，无不“起着强烈鼓舞斗志的作用”。^[20]

在中国近代图书、杂志和报刊的印刷出版发行方面，以及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学生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中国留日学生“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等方面效果卓著、影响极大，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1900年12月，广东籍的留日学生郑贯公（1880—1906）和冯自由等在日本横滨创办的《开智录》，就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之一。而包括广东籍的留日学生胡汉民在内的张继等中国留日学生，于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等，同样亦都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宣传刊物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刊物。这些刊物既“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和时代潮流”，“也体现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和融合”。^[21]此外，郑贯公本人的办报生涯，虽然只有短暂的六年，却先后编辑6家报纸，其中四家报纸——《开智录》、《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唯一趣报有所谓》是他本人主编、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创办的。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既是一个爱国的青年报人，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为数不多的杰出报刊宣传家之一。^[22]

对于留日学生唐宝锷和戢翼翬合著编写的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著名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这本于1900年8月在日本出版的日语教科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比较科学系统的日语教科书，“对后来的留日学生有很大的帮助”，是“划时代的日语教科书”。因为该教科书采用了日式的洋纸和表里两面印刷以及洋式装订，可以说这“是中国印刷史上革命性的事件”。它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23]

而对中外图书交流来说，容闳作为近代“西学东渐”的奠基人，同样也是作出了贡献的。“容闳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援中入西’。如容闳曾促成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及中国图书馆的收藏”。并于1878年将40种书，共1237卷的中文书籍赠送给母校。^[24]“如今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仍保存有一百多年前容闳亲笔写的部分英译目录，书名中有《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山海经》、《三国志》、《康熙字典》及《四才子

三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也是肇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早期启蒙者和先行者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也是肇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启蒙者和先行者。他们不仅将近代西方实用科学,以及近代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外交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和军事思想等介绍和引入中国,而且在一定的客观程度上,积极推进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在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的留学生当中,拥有不少中国近代早期杰出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他们之中既有中国近代早期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工程师、文学家和艺术家,又有中国近代早期最早的一批杰出的海军将领。

由于晚清留美幼童是“应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的需要而诞生的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们学贯中西,兼容世界先进文明,是中西文化融于一身的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群体,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中,具有同时代社会群体无法相比拟的能量”。^[26]虽然,当年120名留美幼童未完成学业,就被突令回国。然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经过自己的奋斗和抗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作出了贡献。

查阅留美幼童名册,诚如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提到的:“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27]在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21名归国留美幼童中有17位是广东人。广东籍的唐绍仪、梁敦彦、梁浩如和梁诚等都是在晚清外交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首任的国务总理便是唐绍仪,他在担任清朝外交部侍郎期间,曾经作为西藏议约全权大臣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谈判中英西藏问题,挫败英国企图分裂西藏的阴谋。在科技界方面,作为中国邮电业的奠基人的20名归国留美幼童中有11名是广东人,广东籍的朱宝奎和唐元湛分别担任过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全国电政总局局长;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的9名归国留美幼童中,广东人竟占8人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邝荣光和吴仰曾两位广东人;以岭南人詹天佑为代表的约30名留美幼童,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铁路建设者,是中国自办铁路的先驱”。他们当中有13人曾在铁路担任要职,广东人就占12人。而归国留美幼童中的广东人唐国安和蔡绍基曾经分别担任过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第一任校长和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之职,两人皆为中国近代早期有贡献的教育家。

此外,对中国近代早期海军建设而言,有43位留美幼童先后投身其中,广东人有31人,占总数的72%。在19名分别参加过中法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的留美幼童中有15人是广东人,占总数的78.9%;在两次海战中为国殉职的7名留美幼童中,有5名是广东人,占总数的71.4%。^[28]实际上,参加中法、中日海战两次海战,还包括不少的留欧归国人员,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中方海军的指挥管带级军官已经以留欧美归国人员居多。民国后,依然留在海军的10名左右留美幼童绝大部分已是舰长、舰队司令和海军次长了。其中成为中国近代早期海军元帅的便有蔡廷幹、吴应科两位岭南籍的留美幼童。以上的数据和事实说明,岭南籍的留美幼童与所有的留美幼童一样,不仅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国捐躯。

为此,有学者在回顾留美幼童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启动进程中的作用时指出:“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文明的中国第一批西洋留学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就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应用与传播而言,他们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是近代中国科技文明的奠基者。也就是说,留美幼童作为中国现代化积累的最早的因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最基础性的贡献”。^[29]应该说,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和恰如其分的。

事实上,对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而言,他们与中国近代留学生相同,不仅将西方的近代

西方实用科学引入中国，也将近代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引入中国，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运动，他们都为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早期，为传播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及观念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中，就有当年第一批的留日学生的唐宝镛。他在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国律师公会会长，成为中日之间的法律问题专家”。不仅如此，唐宝镛在他的一生中，总共著译包括《东语正规》在内的17部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介绍日本等国的法律著作，如：《日本刑法注释》、《日本刑事诉讼法注释》和《日英美德法比六国司法制度》等。^[30]

在中国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运动的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近代留学生，特别是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留下的轨迹，清晰可见。在中国近代早期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思想家的名单上，再次出现了容闳的名字。

岭南人容闳之所以令人敬仰，在于“他的一生，是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使中国现代化而努力的一生”。^[31]他不仅“带动了一个留学西方的浪潮，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32]、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他那与时俱进的社会进步观更是中国近代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在美国“辛勤刻苦”求学的七年间，虽然没有过多的接触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对他而言，“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33]

事实也的确如此，容闳曾经有过寄望于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实施现代化的“未遂理想”。后来，他又曾“应曾国藩之邀筹办江南制造局”，提出创办机械工业的建议，“从此，访求‘制器之器’（‘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作为中国发展工业的基础的思想，对洋务运动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此举既为洋务运动的启动立下首功，也“为中国日后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作了基础性的工作”，^[34]并对中国现代化的继承者有着重大的启蒙作用。然而，容闳最终的目的仍是“教育救国”，当尝试过“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后，尤其是“教育救国”的暂时失败，使得容闳终于走上了谋求变法维新的道路，以致为躲避清政府的通缉，再度到美国避难。虽然，他最终于1912年4月客死他乡，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变化，为急剧进步的革命而高兴。因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欣然亲自将自己的照片寄给这位“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35]此外，作为容闳回忆录的《西学东渐记》（1909年纽约原版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也被后人称赞曰：一是“为岭南人启开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前奏”，二是“启开了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端倪”。^[36]可见容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另一位在中国近代早期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思想家、岭南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何启，是一位既在法律领域有所建树，又在西医东传作出贡献的留英归国学子。他“自1887年起，十几年内先后发表不少政治论文”，由其同学胡礼垣“译成中文，如《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中国改革之进步论》等，认为‘政者民之事’，‘虽君主实是民主’，提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37]于19世纪末期问世的《新政真诠》一书，反映了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的思想。它对洋务新政的“中体西用”论提出了尖锐的批驳，“提出了中国改革必须变未也变本的主张，认为中国必须从政体这一根本处作改革，把资本主义的体和用统一起来”，并由此“提出具有民主色彩的改造中国的整套方案”。该方案是一个“系统地设计了中国走近现代化道路的完整方案”，它代表了中国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一种代表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先进思想”。“后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有受该书影响的痕迹”。^[38]

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去日本的留学生“大多数以政法和军事为专业，关心政治，走上不同的革命道路”。^[39]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自救意识，“他们认为中国要真正实行近代化，必须首先打倒清朝政府”，所以在他们当中才会“出现许多革命之士”。^[40]而在这些革命志士当中，晚清时期岭南留日学生群体十分耀眼，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冯自由等都是其中的翘楚。

廖仲恺和冯自由对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和土地国有理论学说的介绍和阐述，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直接来源；作为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廖仲恺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流派和历史所进行的译介，对于当时中国人探讨社会主义真理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辛亥革命的实行家和宣传家朱执信对马克思和拉萨尔学说的介绍是尤其值得称道的，因为他“在1906年就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自己的研究和介绍，在当时中国人中是较早的一个，他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和认识，在当时也是出类拔萃的。他的介绍和评论，对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然，不仅仅是岭南留日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很大的贡献，从整体上，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的留学生也都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岭南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他一身数任，作为晚清时期岭南留美学生，他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又是超越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创中外文化交流新局面的先驱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

总而言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冯自由、刘思复”等晚清时期的岭南出国留学生，既是岭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也“是一批率先吸收和传播西方最新学说，继续深入地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41]

四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着开风气之先、并把它辐射到全国的作用

总结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开启风气之先这条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所谓开启风气之先，主要包括如下四点：

其一，无论从中国近代最早出国留学人员出国时间的先后、出国所到的国家或地区的先后，还有留学生出国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皆开风气之先。尤其是“1872年到1881年赴美的幼童，是一批先驱者，他们破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为中国后来的留学生铺路，使中国良好的家庭也愿送他们的子弟赴欧美留学”。^[42]而“留美幼童最直接的影响是早期留欧学生的派遣”。^[43]

其二，由于“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首先从留学生中产生，近代第一批学士、硕士、博士也是从他们中间涌现。他们当中有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同时，也正是由于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所以，在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形成的时间上，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无疑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其三，无论是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近代中国留学生思想变迁——“学技术、讲维新，投身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阶段上看，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无疑也是开启中国近代最进步思想潮流的先河者。他们与时俱进，在传播真理，追求光明方面，“是响亮的号角，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其四，由于“晚清‘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个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新文化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留学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起着独特作用，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44]而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作为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他们对“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对中国近代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着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因而，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来说，晚清时

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也是起着先导作用的。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近代岭南已经成为一个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首先起步的文化中转地,所以“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于岭南产生后也不会在此地长驻,而是迅即向全国辐射,造成全国性的影响”^[45]与岭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相一致,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学生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也是起着开风气之先,最早吸取和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然后将此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迅速向全国形成广泛而有强烈的辐射。本文通篇所列种种事例,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27] 容闳. 西学东渐记 [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 [M]. 岳麓书社, 1985. 61, 122, 145.
- [2] 舒新城. 中国近代留学史 [M]. 上海文化出版社, 影印本, 1989. 2.
- [3] [7] [18] [美] 勒法吉, 高宗鲁. 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M].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出版社, 1982. 31, 10, 86.
- [4] [8] 周棉.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 [Z].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62—326.
- [5] [23] [日] 实藤惠秀, 谭汝谦, 林启彦.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14, 172—174.
- [6] [9] [11] [32] [41] [45] 刘圣宜, 宋德华.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 [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244, 248, 239, 279, 500—519, 17.
- [10] [13] 李喜所.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三卷) [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400, 414—417.
- [12] [39] 王镛. 中外美术交流史 [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51—263, 266.
- [14] [16] [20] 钟贤培, 汪松涛. 广东近代文学史 [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388—409, 388—409, 446.
- [15] 周发祥. 中外文学交流史 [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319.
- [17] [31] [33] [35] 钟叔河. 容闳与“西学东渐” [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 [M]. 岳麓书社, 1985. 29, 12, 61—62, 31.
- [19] 丁晓禾. 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第1册) [M]. 珠海出版社, 1998. 78.
- [21] 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M]. 中华书局, 2000. 366—370.
- [22] 朱锦翔. 中国报业史话 [M]. 大象出版社, 2000. 135—137.
- [24] [26] [28] 石霓. 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37, 7, 224—258.
- [25] 高宗鲁. 容闳与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容闳抵美150周年(1847—1997)(打印稿) [A]. 7. 石霓. 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38.
- [29] [美] 勒法吉, 高宗鲁. 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M].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出版社, 1982. 174—194, 张侠, 等. 清末海军史料 [M]. 海洋出版社, 1982. 515—573.
- [30] 沈殿成.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上册) [M].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67—68.
- [34] [36] [38] 李锦全, 等. 岭南思想史 [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303—308, 300—308, 309—317.
- [37] 陈旭麓, 等. 中国近代史词典 [Z].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352.
- [40] [日] 藤加礼之助, 张俊彦, 卞立强. 日中交流二千年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197.
- [42] 祁兆熙. 游美洲日记(附录) [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 [M]. 岳麓书社, 1985. 273.
- [43] 李喜所.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 [M]. 人民出版社, 1987. 76, 302.
- [44] 安宇. 冲撞与融合——中国近代文化史论 [M]. 学林出版社, 2001. 98.